

获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次，三等奖三次，曾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，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

随着全面核禁试条约的生效，核武器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，更多场外工作转入实验室研究，同时国家强调将核技术尽快由军用转为民用，根据工作安排，自1995年后到现在，我转入辐射技术民用研究工作，至今又是20年。我们的研究和应用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，获得了比较好的效益。

在我们相聚时，我总忘不了培育我们的老师。记得1984年8月，我参加在黄山举行的全国辐射加工与研究会议。会上我将自己的论文在会上进行了交流，会前该文章得到付依备老师的指点，会后我将

自己的工作简要向朱永贻老师作了汇报。在回上海的路上，又就辐射技术有关问题请教了他，他耐心细致地给我讲述了很多我理解不深的学术问题，真是受益匪浅，至今记忆深刻。

在纪念毕业50周年之时，我深切怀念原404厂车间主任、821厂总工程师李自新同学，他为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，他到四川后曾多方打听想方设法与我联系，但因保密和我处深山中，一直未能如愿相见，这是极大的遗憾。另外，我们深深怀念先去的老同学高家禄、王自强，我们要为他们的离去默哀，愿他们在天安息。不过，值得欣慰的是他们为之奋斗的原子能事业，如今已有飞跃的发展，他们的贡献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。

## 母校给我一支“猎枪”

○白杰（1965工化）

### 我的清华梦

我原名钦达木呢，蒙族，来自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第二中学，父辈世代务农。我在初中时就确立了自己的理想，长大后要成为工程师。高中三年级时，从招生宣传资料上看到清华大学是工程师的摇篮，我就下决心要报考清华大学。

但我有两个困难。第一，我是民族中学的考生。所有课程，包括数理化，都是用蒙语授课。而上级规定报考清华大学必须用汉语考试。第二个困难是汉语文的考试。我们民族中学高中学的汉语



今年校庆日，白杰学长（前左）与同学团聚

## □ 值年园地

文相当于汉族学校的初中水平。

我的成绩还是很好的，在我们整个年级两个班 100 名同学中排名第一。所以，我还是很有自信的，下决心要报考清华大学。后来，考试结果我的各门功课都发挥得比较正常，1959 年整个内蒙古自治区考进清华大学的有 11 人，我榜上有名。整个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中学的考生有两千多人，我是唯一考入清华的。

### 难忘的大学生活

在清华老师们热心的教诲和精湛的业务传授下，在学校良好校风、学风的熏陶下，我有了长足的进步。在毕业前入了党，获得了学习优良奖状。在清华六年，我还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，经历了困难的磨练和考验。这六年在我一生中是最难忘、最快乐、最温暖的时期。这里面我着重回忆两件事。

一件是我刚入学时，因为我是从民族中学来的，老师上课我听不懂，笔记做不下来，作业也不能独立完成，压力很大。当时，我们的班集体给与了热情的帮助。下课后，我就看蔡德陵同学、栾贵时同学、李瑞清同学的笔记，把自己的笔记补上。在他们的帮助下，我也能完成作业了。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，我终于跟上来了，课也能听懂了，笔记也能做下来了，作业也能独立完成了。

还有大学三年级的一件事：有一天，我们十几个同学在 8 号楼东门的空地上打排球，我不小心把脚崴了，当时疼得很厉害。以班长刘硕屏为首的几个同学，立即用自行车把我驮到校医院进行了处置，幸好没有骨折。第二天，脚肿得很厉害下不

了楼，也上不了课、吃不了饭。我们宿舍的同学便为我打饭，为了减少耽误课程，栾贵时、刘硕屏等同学用自行车把我驮到教室，上完课再把我驮回来。这样折腾了差不多半个月，同学们对我的关心照顾，我是终身难忘。

在学习方面，我向蔡德陵、李瑞清、周理、赵明龙等学习好的同学学习，暗暗地跟他们看齐，向他们学习。在政治思想方面，向李克健、栾贵时、赵依坚等同学学习，以他们做榜样。李克健同学是高干子弟，但他平易近人、乐于助人。栾贵时同学和我住一个宿舍，是学生会干部，每天晚上熄灯后的一段时间给我们传达上级有关精神，传递正能量。特别是他传达的上世纪 60 年代初广州知识分子大会上，周总理、邓小平、陈毅等领导同志的讲话片段，对我正确认识红与专的关系，树立科学的人生观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。

我们班的同学，个个都是我学习的榜样。比如亓平言同学，是我们班的“活宝”，他动手能力很强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气象台做毕业设计时碰到难题，系统不能稳定运转，主要是流量计卡脖子。据说这是 3 字班、4 字班都没有解决的问题，亓平言却解决了这个问题，我亲眼看到他设计的流量计。亓平言在文艺方面也有两下子，会作词、作曲，而且还会表演。1962 年在农村劳动时，最后一天晚上和农民联欢，亓平言同学表演《逛新城》，他扮演父亲，演得有声有色。

### 母校给我一支猎枪

毕业后，我们背上清华大学给予的“猎枪”，奔赴工作岗位——核工业部直

属 202 厂。202 厂地处包头市，是一个大型厂、所合一的生产核武器的军工企业。我在 202 厂完成了一年的劳动实习后，被正式分配到了这个厂的第三研究室。该室的室主任是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同志，我们国家第一代的核工业专家。可惜的是，他在“文革”初期 1967 年的 11 月，由于不堪忍受造反派的批斗，含冤卧轨自杀。

我在“文革”时期没有站错队，也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和干扰。但在“文革”清理队伍阶段，差一点被当作“内入党”分子抓起来。他们掌握的所谓证据有两条：一个是我父亲，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大文盲。他来 202 厂后，因为不会说汉语，经常到 202 厂的几户蒙古族人家串门。这几户蒙古族职工都被当做“内入党”分子抓起来了，他们怀疑我父亲是“内入党”的联络员。第二个所谓证据是，1966 年我在 202 厂教了两个多月的蒙文蒙语的职工夜校课程。当时，自治区在乌兰夫主席的倡导下，汉族干部掀起了一股学习蒙文蒙语的热潮，这样有利于民族团结，也有利于汉族干部做好少数民族的工作。我们厂也办了蒙文蒙语夜校班，我被聘为老师。这个课在“文革”的干扰和冲击下，只办了两个多月就办不下去了。他们把我和乌兰夫的所谓黑线挂起钩来。有幸的是，党中央、周总理及时发现了这些错误做法，在 1969 年 5 月 21 日发文件进行了纠正，要求彻底平反。

在 202 厂基层我工作了 19 年后，被提拔到总厂的领导岗位上，又工作了 16 年，直到退休。在业务方面，由于有母校给予的“猎枪”，所以每逢遇到困难和问题时都能从容应对，迎刃而解，做出了十

几项科研成果。其中有两项获得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、三等奖。在职称方面，我由技术员到助理工程师、工程师，然后到高级工程师，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我当工程师的愿望。在职务方面，从行政组长、副科长，然后直接提拔为副处长，1984 年被提拔为总厂党委副书记、副厂长（副厅级）。

我之所以被提拔到总厂领导岗位上，一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；二是因为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在 202 厂职工中有很好的口碑；第三，因为我是少数民族干部，我们厂清华毕业生很多，大概有二三十人之多，比我强的大有人在。

## 七律 再相逢

○孙家山 (1975 精仪)

近接同学通知，将在母校举办 1975 届毕业 40 周年纪念大会，心潮涌动，感慨系之。遂赋诗一首，表述心怀。

弹指倏忽四十春，  
沧桑难见少年痕。  
眼前几近蹒跚态，  
当初何等精气神！

风云散去无处觅，  
芳芳重来不须寻。  
笑看清华好日月，  
此地长聚一代魂！